

临床经济学能终结贫穷吗

◎葛传红

政府政策和治理仅仅是贫困国家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差异化的诊断的要诀在于，只有对地理条件、政府失灵和文化因素等具体环境作仔细诊断，才能对问题有精辟理解。贫穷的终结不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状态，更意味着经济进步的开始以及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信心和渴望。

近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之下，世界人口和人均收入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增长着，正日益创造着一个让世人惊叹的神话；它不仅经常成为环球媒体醒目的新闻标题，而且也是我们每日可看可见的客观实在。从纽约迈哈顿耀眼的写字楼到印度孟买庞大的工业园，从北京笔直宽广的长安街到卡塔尔迪拜市中心的现代化广场——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我们忽视这个社会不完美的一面。直到今天，仍有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被困于贫困陷阱之中，每年都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

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就如同一场马拉松比赛，绝大部分人在路上被甩掉，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跟得上，进而受益。由此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彼此距离也越拉越大，这正在日益将世界雕刻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富人的世界，一个是穷人的世界。人们发现，一方面富人在饕餮鱼翅鲍鱼的清爽，另一方面贫者却在细品红薯玉米的味道，正如英国《观察家报》今年8月的一个版面所显示的，第一张图，是斥资两亿英镑、装修得富丽堂皇的英国贵族幼儿园；第二张图，是田埂边满脸泥巴的孟加拉学龄前农村儿童。在这里，贫与富形成了一个残酷的对照。

面对这样的全球难题，250年前



《贫穷的终结》

——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

(美)杰弗里·萨克斯著

邹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悲观的结论是，除了战争、屠杀、瘟疫等残酷手段之外将毫无办法。然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素有“休克疗法之父”之称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却没有这样的悲观。相反，他在新著《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乐观地宣称，贫穷并非与生而来，人类完全有能力在2025年消灭极端贫困，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结束我们这个时代贫困问题，在萨克斯教授看来，并不是一个预言，而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在过去20年中，萨氏一直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首脑、财政与卫生官员一道工作。他说自己曾到占世界人口90%以上的100多个国家访问与工作过，从多个角度观察了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对当前全球贫困问题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不仅如此，萨氏还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线索，指出了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向我们逐一剖析了导致贫穷的不同成因。

萨克斯认为，要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要对症下药，他认为结束贫困的关键在于帮助这些穷人登上发展的阶梯，至少使他们在梯子底层获得立足点，从而使他们可以自



己攀登。在萨氏眼中，这个世界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梯，即全世界有15亿穷人，他们要向中等收入阶梯迈进（全球约有25亿人属于中等收入），进而达到富裕这一台阶（全球有10亿人属于这一阶梯）。他指出，如果没有办法踏上发展阶梯，便不能开始其摆脱贫困的进程。

其实，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踏上发展阶梯的第一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萨克斯被多次邀请治疗那些危机横行的国家，他有过在玻利维亚和波兰的辉煌，但也有在俄罗斯遭遇“滑铁卢”的痛苦。从那以后萨克斯成了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休克疗法”顿时成为一个“恐怖的词语”。实际上，曾经炙手可热的萨克斯在主持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之后，行事便转为低调，辞去了很多顾问职务，潜心反省过去的成败得失。

从这种角度来说，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荣辱的回顾。同时，他也发现了发展经济学与临床治疗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便石破天惊地提出了他的新哲学——“临床经济学”。

萨氏的临床经济学来自他做儿子科大妻子的灵感，他说常常在夜里，他怀着敬畏之心看着妻子索尼娅(sonia)快速高效地处理急症和其

它复杂病症。萨克斯就想，现在的经济发展能否像临床治疗学那样准确地对症下药呢？萨氏以为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要实行差异化的诊断，他还形象地说“当你听到马蹄声时，首先想到的是马，而不是斑马”。所以，他认为经济学家要向临床医生一样，需要学习区别诊断的艺术。

可是，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仅仅看作是政府政策和治理的问题，但萨氏认为这其实并不公平，因为这仅仅是贫困国家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他认为，差异化的诊断的要诀在于，只有对具体环境作出仔细的诊断，才能对问题有精辟的理解。所以，对于地理条件、政府失灵和文化因素等都要全盘考虑，防止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难能可贵的是，萨氏以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国际援助中往往带有的意识形态因素，指出这正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西方

政治经济制度的工具，“这一切都对结束全球贫穷问题于事无补，相反还会成为相当负面的因素”。事实上，这本书是关于如何作出正确选择的总结，即基于真正对人类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从而能够导致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选择。萨氏希望人们通过他的科学的研究和实际的顾问工作，逐渐认识到我们这个星球贫困人口形成的真正原因，以便在望闻问切之后，药到病除，将整个世界带到一个更加繁荣的阶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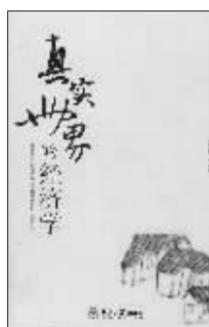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贫穷的终结不仅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状态，更意味着经济进步的开始以及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信心和渴望，这也是萨氏“临床经济学”内在的雄心壮志。在萨氏学术和顾问生涯中，可能没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了。同时，这也许是萨氏在对“休克疗法”痛定思痛之后，给予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吧！

国企天大难题： 没有原发性合同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周其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



◎胡飞雪

爱因斯坦曾经有过奇思妙问：鱼儿认识它所置身于其中的水么？此问有点玄，这里暂且放下不管，笔者想要说的是，人们认识他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经济环境么？相信没有几个人敢说她能够认识。物以稀为贵，在当前中国，在很多人都不敢说她能够认识我们的经济环境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能够把我们的经济问题解释得很清楚、很明白，很容易让人理解，那么，这个人的言说就应当引起我们的刮目相看。周其仁先生是当今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的佼佼者，今天就谈谈他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周其仁讲解中国经济问题，沿袭了白居易的优良传统，他在完达山做牧马人的时候，有意找不识丁的农民聊大天儿，意图是试着把经济学原理同从可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糅合起来，讲解得让最普通的人也能明白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的，当许多经济学家热衷于利用数学模型来把经济现象论证得异常深奥、复杂以期博得洋人的首肯、圈内人的喝彩的时候，周其仁一以贯之地用他的大白话来向普通大众讲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在本书的序言里说：“我早就知道，自己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这不是说，我不好读书，读书是我所好，但还必须到书外的真实世界里求甚解。”周先生此言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一、读书有没有用，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读书虽好，还须切记要读好书；二、即使是好书，值得看，但这书也未必是真实世界的完整、及时、准确的记录，要研究问题，求甚解，还须扑身到真实世界中；三、真实世界(无字之书)是文字之书的本源，文字之书是真实世界的反映、总结、简化，要求甚解，要探寻解决问题之道，应把两本书合在一起读，“两个独立信息源才能证实一条消息”，法学上的这条原则可以借用以经济研究。

有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说来说去还说不到点子上，大概跟断章取义地理解“学术研究无禁区，对外宣传有

纪律”有关，周其仁对此显然有他执着的追求，所以往往他一动笔，即能直击要害。比如，他这样剖析国企问题：“中国国有企业非常特别，它的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市场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我是相信契约理论的，一开始就说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其他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它是一组合同，一组合同就构成一个企业。而我们公有制企业，无论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要打上问号。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者有关，以后又经过敲锣打鼓改造私营企业，改造完了后，把原来的合同完全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变成了公有企业，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它的基本性质不是一组合同，它事前就没有讲好。”

周其仁认为，“这是天大的难题”(以上见《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一文)。

不是有人曾这样总结吗，说国企改革“政治上很敏感，技术上很复杂，置疑起来很容易，辩论起来很困难”，造成今天的天大难题，以至下来看，原因端在于产权问题上忽视了常识。《吕氏春秋·审分览》引慎子话说，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由未定。企业产权的本质特性之一就是排他性，愣要人人有份、全民所有，产权属性不明确，利益关系不确定，遂使百人争逐、利益冲突、矛盾纷争不已。今天的国企改革，之所以曲折反复、痛苦不堪，不正是因为谁都可以半路杀出来，横跨一脚，主张国有资产也有他一份吗？

所以，若真要科学发展观，若真要构建和谐社会，若真要与时俱进，首先必须告别昨天，回归理性、纠正错误，恢复并尊重常识，深入真实世界，实事求是，把产权(也是最重要的人权)界定清楚。

找到足够的石头，满足麦哲伦基金庞大的胃口。林奇的勤奋是有数据可查的。一年要走访500至600家公司，每天6点就去办公室，晚上7点多才回家，路上的时间都是在阅读。每天午餐时都跟一家公司洽谈。在平常陪妻子购物时也在考察公司，在和妻子度假之时，也是随时在作公司调研。“1980年我总共拜访了214家上市公司，1982年增加到330家，1983年再增加到489家，1984年略减到411家，1985年又增加到463家，1986年更是增加到570家。”如此的辛勤劳动，岂能说林奇只是靠灵感，靠表面的频繁换股的灵活性获得投资成功呢！

选到了好股，未必一定就会成功。华尔街上传流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投资者买了一只涨幅200倍的股票，最后却跳楼自杀。如果他只买了100股，选到了好股，还要敢下重注才行。林奇投

他的骄人业绩。他自己说：“我的选股方法是艺术、科学加调查研究。20年来始终未变。”所谓科学，就是要看财务报表，要作数量分析。艺术则是需要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感。这两个方面在选股时都很重要，但过于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非常危险的。数学分析也好、艺术灵感也好，最终还是要到上市公司去实地调查，要跟其管理层交流、对话，才可以真正懂得这个公司，才可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投资。

选股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寻找值得投资的好股票，就像在石头下面找小虫子一样。翻开10块石头，可能只会找到一只，翻开20块石头可能找到两只。”而林奇每年要翻开几千块石头，以

及至成功的几只股票都是他的重仓股，往往是达到了一只基金可以达到的总资金5%的上限。1982年买入的克莱斯勒就是这样一只重仓股，还有沃尔沃和房利美。从克莱斯勒公司身上赚了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沃尔沃获得了7900万美元，最神奇的是房利美，一只股票为麦哲伦基金赚了5亿美元。这是选到好股重仓下注，赢取巨额利润的最佳案例。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耐心持股。在这方面，林奇在投资生涯的初期有切肤之痛。他很早就发现了家得宝建材公司，当时股价只有25美分，他买进持有一年后就卖掉了，15年后上涨了260倍。同样的股票还有玩具反斗城、阿尔伯特、联邦快递，都因为没有耐心持股而错失几十倍几百倍的收益。由于有了早期的教训，林奇在后来的投资生涯中，一旦找到好公司都是长期耐心持有，1982年买入的克莱斯勒一直持有到汽车股一个周期的结束。1977年开始买入房利美，中间有过反复，等他认定这是一只可以放手一搏的好股后，就逐年增仓，成为第一重仓股，耐心持有，1991年林奇离开富达基金依然未变。

从《战胜华尔街》这本书来看，选股、重仓、耐心持有几乎是成就彼得·林奇基金奇才的基本步骤。但是，很多普通投资者会认为自己缺乏林奇那样的接触公司大人物的机会，没有办法考察上市公司，所以林奇的经验对他没有用。但是，林奇在书中多次强调，个人投资者比基金投资者有更多优势，在选股这件事上同样如此。“作为业余选股者，根本没有必要非得寻找50至100个能赚钱的好股票，只要10年内能够找到两三只赚钱的大牛股，所付出的努力就很值得了。”而至于能不能见到公司高层，这并非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只要我们随时留心日常生活，注意吃穿用的生活用品，有可能比基金经理更早发现好股票。林奇详细叙述的美体小铺的例子就非常典型，而“零售业选股之道，边逛街边选股”几乎就是林奇专门为普通投资者选股做的示范，个人投资者如果想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挑出好股，这一章非常多读几遍不可。

找到足够的石头，满足麦哲伦基金庞大的胃口。林奇的勤奋是有数据可查的。一年要走访500至600家公司，每天6点就去办公室，晚上7点多才回家，路上的时间都是在阅读。每天午餐时都跟一家公司洽谈。在平常陪妻子购物时也在考察公司，在和妻子度假之时，也是随时在作公司调研。“1980年我总共拜访了214家上市公司，1982年增加到330家，1983年再增加到489家，1984年略减到411家，1985年又增加到463家，1986年更是增加到570家。”如此的辛勤劳动，岂能说林奇只是靠灵感，靠表面的频繁换股的灵活性获得投资成功呢！

选到了好股，未必一定就会成功。华尔街上传流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投资者买了一只涨幅200倍的股票，最后却跳楼自杀。如果他只买了100股，选到了好股，还要敢下重注才行。林奇投

找到足够的石头，满足麦哲伦基金庞大的胃口。林奇的勤奋是有数据可查的。一年要走访500至600家公司，每天6点就去办公室，晚上7点多才回家，路上的时间都是在阅读。每天午餐时都跟一家公司洽谈。在平常陪妻子购物时也在考察公司，在和妻子度假之时，也是随时在作公司调研。“1980年我总共拜访了214家上市公司，1982年增加到330家，1983年再增加到